

章念驰——编

章太炎生平与学术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章念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章学研究论丛)

ISBN 978-7-208-13791-2

I. ①章… II. ①章… III. ①章太炎(1869~1936)
-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B259.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1615 号

责任编辑 张钰翰
营销编辑 许卓 陈雷
封面设计 范昊如 周小桐

章太炎生平与学术

章念驰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16 印张 65.5 插页 8 字数 722,000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791-2/B·1183

定价 158.00 元

(全二册)

章太炎与鲁迅*

章念驰

上、论章太炎与鲁迅的早年交往

章太炎先生与鲁迅先生的师徒之谊，人皆知之。郭沫若曾说：“太炎先生早年的革命精神和治学态度，无疑是给了鲁迅先生以深厚的影响。”^①这真是知者之言。鲁迅于1908年从师章太炎，距今八十余年，关于他俩交往，记载甚多，但错讹不少；至于思想上、学术上、政治上的相互影响，论者语焉未详。也许是这个题目过于复杂，这两位文化巨匠，是近代中国第一代与第二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学术上精深博大，思想上体系异常庞杂，想把握二人的思想与学术，诚非易事，作一比较研究，更是困难。但这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课题。我不揣浅

* 本文原为两篇，上篇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301页；下篇发表于《上海鲁迅研究》2010年春季，第129—144页。

①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载《历史人物》。

陋,试作议论,就章太炎与鲁迅早年交往以及对鲁迅思想与学术产生的影响,阐述一孔之见,求教于学界诸公。

一、章太炎与鲁迅的早年交往

章太炎与鲁迅真正相交始于1906年,在这之前只是神交而已。

章太炎长鲁迅十二岁,都是浙江人,都出身于破落的书香门第。太炎祖籍汾水,后迁至绍兴府道墟镇,最后移居余杭县仓前镇,因此他们还算有点乡谊。

太炎与鲁迅都出生于晚清时代,目睹国事日非,风雨飘摇,都曾寄望于变法维新。太炎因年长于鲁迅先生,得以亲与戊戌变法,成宣传改良的论集《诂书》,至遭追捕。变法失败后,太炎领悟到清政权必须推翻,否则无以拯救中国,乃剪发示决,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撰《正仇满论》,序《革命军》,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昌言革命,导致“苏报案”,慷慨入狱,大大激发了民众反清情绪,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初登历史舞台时的英雄气概。鲁迅知道章太炎的名字,即始于此时,他说:“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西牢。”^①这对当时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鲁迅,冲击自然很大,他到日本去留学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因此,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教授称太炎是鲁迅“思想上第一个革命的师”。

鲁迅到日本后,在革命空气十分浓厚的留学生中,精神更为振奋,一有功夫,“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②并在弘文学院

①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刊《且介亭杂文末编》。

② 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刊《且介亭杂文末编》。

江南班中,第一个剪掉了辫子,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太炎当时囚于西牢中所写的《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四首诗,都传到日本,“最为鲁迅所爱诵”,^①直至三十三年后,鲁迅临终前十日,扶病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时,这几首诗又涌于眼前,便全文录于文内,并深情地说:“太炎先生狱中诗,卅年前事,如在眼前”,这几首诗“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当时太炎另一篇鼓吹种族主义的文章《张苍水集后序》,也是鲁迅特别爱诵的诗文。虽然那时他俩未曾面识,但对鲁迅来说,太炎在他心目中无疑占据了重要地位,在这种影响下,鲁迅在东京参加了光复会。^②

鲁迅与太炎相见,是1906年之后的事。当时太炎因“苏报案”刑满释放,7月初抵达日本,他作为“革命党之骁将”,在留学生心目中具有英雄形象,受到热烈欢迎,七千多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为他召开了欢迎大会,倾听了他著名的革命演说。当时,鲁迅刚刚从国内完婚后返日,他有没有去参加欢迎会或聆听太炎演讲,难以确知,但王士菁在他的《鲁迅·章太炎·尊师重道》一文中说,“鲁迅作为激进爱国、胸怀兴亡感的青年留学生,很可能也参加了这个七千人的大会”。如果鲁迅确曾参加了这欢迎会,那么,这就是鲁迅第一次见到了太炎。

太炎抵日本后,投入了繁忙的革命活动之中,主持《民报》笔政,并协助孙中山制订《革命方略》等文献,同时他未放弃讲学和学术研究,自觉把革命实践和理论斗争及学术研究,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

①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写于194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② 鲁迅参加光复会事,近年史学家已予肯定,此不赘言。

民利益相结合,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太炎清晰认识到,要推翻清政府,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制造舆论,启发民智,廓清莠言,解放思想,促进民族的觉醒,因此他致力舆论革命。他针对当时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和一些没落文人所鼓吹的“保存国粹”,对国学进行“层层剔抉,而易之以昌明博大之学说”,^①让古老的国学,不再成为当局用以麻痹民众的“国粹”,而力图为近代中国创造一种新型的民族文化。太炎在抵达日本后两个月,即创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又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出版《国学振起社讲义》。他认为,“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②革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如果“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③但他所讲的国学,与封建专制当局提倡的国学,有本质之别。国学讲习会所说的国学,“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完全不是当局提倡的经天纬地的四书五经,而是取旧学之精华,剔除糟粕,使国学在救亡图存中起到积极作用。太炎这些言论,对当时知识分子思想解放,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他这些言论活动,在《民报》中都有报道。

鲁迅是《民报》的忠实读者,他不仅爱读《民报》,而且还把它收集起来,装订成册。他当时虽然知道太炎创办国学会事,但正彷徨于“医学救国”与“提倡新文艺来改良社会”这样一条“治人”还是“治国”的十字路口,所以没有立刻成为太炎讲学的第一批学生。次年,鲁迅移居东京本乡东竹町中越馆,弃医从文,与革命党人陶成章、龚未生、

①②③ 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作于1906年,载《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出版。

陈子美、陶冶公等交往日频,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①而“陶成章和龚未生几乎每日必至”^②太炎寓所,“另有章行严、秋瑾、周作人、吕操元、陈独秀等亦为(太炎)座上客”。^③这期间太炎与鲁迅之间有这么多共同朋友,必然会导致相识与交往,但鲁迅真正从学拜师太炎却是1908年的事。

1908年初,太炎在东京牛込赤城元町清风亭开设“国学讲习会”,后移往日本帝国教育会,最后改在神田地区的大成中学讲堂。4月,始讲解《说文解字》。当时鲁迅应许寿裳之邀,移居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居,与许寿裳、朱希祖、钱家治、周作人同住,称之“伍舍”时期。这时鲁迅挚友朱希祖、钱玄同、龚未生、朱宗莱等都在大成中学听太炎讲《说文》,鲁迅与许寿裳也很想去听,但苦于与学课时间冲突,因此托太炎女婿龚未生向太炎请求,希望另设一班讲授《说文》。经太炎同意,在太炎寓所——即牛込区二町目八番地的《民报》社——设立了一个小班,时间是1908年7月,参加者为鲁迅及许寿裳、钱家治、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朱宗莱、龚未生八人。但是太炎在大成中学所设的大班,并没有中辍,因此钱玄同等人是既在大班上课,又在小班继续听课。而过去许多史书混淆了大班与小班之别。其实太炎在日本讲学,受业人远不止大成中学与《民报》社一些学生,他自称受业“百数十人”,包括黄季刚、沈兼士、汪旭初、任鸿隽、马幼渔、杜羲、陶冶公、余岩等名人,当然包括鲁迅等八人,以及一些日本与印度的学者。

过去许多记载说,鲁迅等人去《民报》社听课,是每周一次,每次

① 周遐寿:《鲁迅的故家》。

②③ 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定于星期天上午举行,此说几成定论。近读朱希祖《日记》,颇为详尽,1908年7月11日记道:“八时起,至太炎先生处听讲音韵之学,同学者七人,先讲三十六字母及二十二部古音大略”。这就是小班讲学之始,清楚无误。可是,仅隔三日,7月14日记道:“八时,至太炎先生寓,聆讲江氏《四声切韵表》”;又隔三日,7月17日又记道:“上午至太炎先生寓,聆讲音韵之学”;四日之后,7月21日记道:“午后,至余杭(即太炎寓所)聆讲音韵及《新方言·释词》一篇”;七天之后,7月28日记道:“上午,至太炎先生寓,重上《说文》,自一部讲起”。由此可见,鲁迅等八人从学太炎时间为1908年7月,受课每周至少二次,并非一次。

太炎为鲁迅等所开的小班在《民报》社内一间陋室中上课,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太炎“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①鲁迅十分认真地听讲,用功地作笔记,他“极少发言”,^②总是默然听记,仅有一次为文学定义,向太炎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小班的教学气氛是和谐的,师生关系是融洽的。太炎按《说文》部首“一个字一个字的讲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枯燥的材料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

① 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制言》1936年第25期《太炎先生纪念专号》。

②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原作写于1947年。

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一尊庙里哈喇菩萨”。^①讲学时，钱玄同先生“发问和辩论最多”，^②又好在席间爬来爬去，鲁迅先生曾风趣地给他一个绰号，叫他“爬来爬去”，至老还戏称他为“爬翁”。听完课，他们又经常聚在一起核对笔记，学习态度极为严肃。笔者曾亲睹鲁迅及钱玄同、朱希祖听课笔记，^③从笔记来看，鲁迅记得最简却最为严整恭正，钱玄同记得最全，朱希祖正如许寿裳所说“记得最勤”。^④这一段学习生活，是令鲁迅终身难忘的，甚至在二十八年后，他回忆起这段听讲情景，仍有一种甜蜜感，说：“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⑤难以忘怀。

讲学“大约继续了有一年多的光景”，讲完《说文》后，“似乎还讲过《庄子》”。^⑥但从钱玄同的记录，以及朱希祖日记，可以证实，鲁迅不仅听过《说文》，还听过《庄子》《汉书》《文心雕龙》等。这一年多师生生活，对鲁迅影响是深远的，鲁迅也十分珍视这段师生因缘，可以说这是鲁迅与太炎一生交往中最美好的时期。

这期间，鲁迅与太炎除了教学关系外还有不少美好交往。鲁迅兄弟俩当时翻译《域外小说》时，曾得到过太炎大力帮助。鲁迅兄弟翻译俄国斯谛普基克的《一文钱》，亦曾请太炎看过，改定了好些地方，后刊登在1908年6月的《民报》上。1908年10月，《民报》遭日本

①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民报社听讲》，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

②④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③ 笔者亲睹鲁迅笔记分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和绍兴鲁迅纪念馆，今由杨克平出资印出，名为《说文札记》。朱希祖笔记今由北京鲁迅纪念馆收藏，钱玄同笔记由其长子钱秉雄收藏。按：今已由王宁先生等整理为《说文解字授课笔记》，收入《章太炎全集》。

⑤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⑥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民报社听讲》。

政府封禁,并处以罚款一百五十元,日本法院宣布“限定时日,倘不如数交纳,则将编辑人兼发行人章太炎,罚做苦役以抵偿”,以服劳役一天抵作一元。而当时太炎生活异常艰苦,“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①还要领导舆论革命与讲学,根本无力缴纳罚金。1909年3月7日,日本政府以无力支付罚金将太炎拘捕,准备处以劳役。鲁迅等闻讯,即与许寿裳急商,于是将他们翻译《支那经济全书》的部分印刷费,替太炎缴纳了罚金,终于使太炎在关押一天之后即得释放。1909年春夏之际,太炎请了印度梵师密史逻讲授梵文,特约鲁迅兄弟同去学习,并热情地为他们垫出“半月学费”,但鲁迅因回国在即,未能往听,只有周作人一人去听了几次。1909年7月,鲁迅结束了在日本七年的留学生活回国,但他与太炎关系并未因此告终,他们亲密的关系至少保持到五四运动的前夜,而鲁迅对太炎的敬仰则终生未变,鲁迅“每逢提起(太炎),总严肃地称他太炎先生”,^②或呼为“章师”“章先生”。

鲁迅回到家乡绍兴后,1911年初,他与同门许寿裳、朱希祖等章氏子弟,集资为太炎出版了他在东京讲学基础上所撰成的一部文字学的重要著作——《小学答问》。

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鲁迅极为兴奋地迎接这伟大的变革。他积极配合革命军光复绍兴,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演讲,宣传革命,并担任了新政权下的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创办了《越铎日报》,力图协助革命军政府励精图治建设一个新中国。但这希望很快落空了,

① 黄季刚:《太炎先生行事记》,《神州丛报》(121)1913年8月。

② 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

他“到街上去走了一遍，满眼是白旗，然面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①杀害秋瑾的主犯——章介眉被释了，而辛亥革命的功臣、光复会的首领、鲁迅的老友陶成章却遭革命党内部人的杀害。这种失望几乎使光复会会员都沉默了。加之办校经费不足等原因，鲁迅辞去了校长职务，应许寿裳邀请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工作。不久，袁世凯上台，他又随教育部迁往北京。袁世凯政权下的教育部，完全是一个官僚机构，无公事可办，“枯坐终日，极无聊赖”，鲁迅不得不“整天看书”来打发岁月。袁世凯自上台，日复暴虐，暗杀宋教仁、建立孔教会、倡尊孔读经，最后复辟称帝，这一切倒行逆施，使鲁迅不胜迷惘和苦闷，而最使鲁迅困惑和痛心的是，他尊敬的老师太炎，也被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囚禁了起来。

辛亥革命爆发，太炎闻讯即赶回祖国，但在民初纷杂繁乱的政局中，他变得无所适从。开始他忙于光复金陵，组织北伐，创办《大共和报》，组建中华民国联合会，建立统一党。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聘他为高等枢密顾问，袁世凯也聘他为高等顾问和东三省筹边使，他在民初各种矛盾旋涡中努力捍卫辛亥革命成果。但是陶成章遭暗杀，扩大了他与孙中山等的隔阂。宋教仁遭暗杀，促使他对袁世凯的觉醒。于是他孤军作战，独往独来，以他的是非标准，批评时政，因此各种政治势力既害怕他，又想拉拢他，利用他，甚至不惜诋毁中伤他。各种褒贬文字时现于报章，鲁迅看在眼里，十分同情和担心他老师的处境。鲁迅本人虽然没有参加多少社会活动，也没有加入什么党派，但

^① 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

在这纷争的政局中,他显然是站在他老师的一边,他曾以很形象而含蓄的笔调,说过这样一段话:“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①

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使辛亥革命成果落入袁世凯手中,现实教育了革命党人,于是发起了“二次革命”,但革命很快失败了,孙中山等再度流亡海外,太炎也被袁世凯羁禁于北京三年。幽禁中太炎以各种形式抗争,毫不屈服,鲁迅曾作过高度评价,说:“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②鲁迅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去看望囚禁中的老师,还劝绝食中的老师进食。在鲁迅的日记中,即留下了七次探望记录,而且每次去都是“晚归”“夜归”“傍晚归”,大年初一还去给太炎师拜年,给囚禁中的老师带去许多温暖。身处囹圄的太炎很感激鲁迅,曾亲书《庄子》一段话赠给鲁迅,鲁迅一直珍藏着这幅字,直至去世。

在袁世凯统治期间,鲁迅虽然没有像太炎那样站出来与当局面对面斗争,但他以沉默来进行抗议。当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日,他“卧居家中,拒不参加‘庆典’”;袁世凯通令全国“祀孔”之日,他拒绝参加,并在日记中写道,“全日无事”,予以蔑视;袁世凯颁布《着教育

① 鲁迅:《华盖集·补白》。

②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部拟提倡忠孝节义施行办法》时，他愤而辞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的职务，这一切可说是与太炎的精神相通的。

1916年，袁世凯政权的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研究汉字的标准读音。会上有人主张用国际音标，有人主张用清末简字，各持己见，争论不休。鲁迅等在会上提出了太炎早年所创的一套标音符号，力称这是符合国情而可通行的注音符号。但有些人出于偏见在会上加以反对，于是鲁迅在会上发言，坚持主张，阐明理由，终于使会议通过了以太炎的注音符号为基础作为全国通用注音符号的决定。这套注音符号一直沿用到今，这中间也凝集着鲁迅的努力。

1916年6月，太炎因袁死而复得自由，只身南返，从此与鲁迅分居南北，很少相见了。而且他们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大不相同了。“五四”之后，鲁迅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急先锋，与太炎对文化的态度显然有别，政治趣向也不尽同，亲密程度再也没有超过《民报》社听讲及被袁世凯幽禁期间的融洽。至于他俩后期交往以及相互影响，本人将另外行文。

二、章太炎对鲁迅早年的影响

鲁迅一生中的老师为数不少，但对他影响最大、最受他尊敬的，恐怕要算藤野和太炎。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教授说过：“在鲁迅的一生中，能使他对其怀有深深的敬意和爱情的‘师’是极少的，而太炎就是这极少的‘师’中的一人，恐怕除了藤野严九郎先生外，太炎是唯一的一位了。”^①鲁迅从师太炎，自有前提，他并不是单纯地崇拜太炎

^① 岛田虔次：《章太炎的事业及其与鲁迅的关系》，拙编《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的小学,仅仅为了跟太炎学习《说文解字》,也不是单纯地羡慕太炎精深博大的学问,而是尊敬仰慕太炎的民族气节和革命道德。鲁迅曾说,“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名声,远在孙诒让之上者”,^①是因为他是革命先驱,“排满的骁将”,前去听讲,也并非只因太炎是学者,却因为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鲁迅以太炎为师,首先是向太炎学“为人”,将太炎作为思想上的师,其次才是学“为学”,将太炎作为学术上的师。因此,太炎对鲁迅的影响,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首先可以说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其次是学术文化方面的,乃至为人个性、爱好诸方面,影响可谓深远。本文于此欲深入作些窥探,为便于剖析,求教诸公,将分而论之。

(一) 章太炎对鲁迅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思想界对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要算太炎先生了,岛田虔次教授曾正确地说:“在宣扬革命大义、掀起革命风潮这一点上,蜂起的孙文、黄兴,也不及太炎的言论。孙文在广州以及其他地区的起义,以及《兴中会宣言》(夏威夷、香港)在当时也只不过是在边境或是在外国的局部地区的事件,还没有力量动摇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灵,真正的去唤醒中国内地的知识分子的民族革命意识,而且使其对立於改良派的,无论怎么说,也应该是太炎的‘苏报案事件’。而且作为革命前夜的最左翼的宣传报道机关的《民报》的主笔,也是十分健斗的”。^②鲁迅即是当时深受太炎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

太炎成为革命派代言人,他的思想演变也是走过了一条曲折的

^① 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② 岛田虔次:《章太炎的事业及其与鲁迅的关系》。

道路,与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经历相似,所以他的觉醒与反戈,对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影响尤大。太炎曾惊羨过西方的“奇技淫巧”,赞赏过西方的“坚甲利器”,崇拜过西方的“科学文明”,推崇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把“进化论”当作野蛮渐进文明的天理法则,因此欣赏过严复的《天演论》,拥护过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这种经历,这种思想,在当时很有代表性。鲁迅在近代西方挑战面前,也曾冀望过振兴科学,实行变法,爱诵读严复《天演论》及林纾的著述,崇拜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科学思想,企图以科学进步来拯救在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他选择学医,也正是他拥护变法维新的表现,他说:“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他学医正是希望“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①鲁迅在日本接受的影响是很广泛与多元的,但是,促使他思想变化,从维新到革命,从“科学救国”到“政治救国”到“文学救国”,无疑是受到太炎的影响。

20世纪初叶,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如康有为、严复等将西方不少先进学说传入中国,使人看到进化论带来了科技进步与物质文明,遂使人们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共同文明,因此只要把西方一切现代化的东西搬进来,中国也就会现代化了。太炎则是第一个批判康有为、严复学说的人。太炎虽欣赏过严复的理论,但他很快认识到进化论仅仅是自然规律,并非社会原理,因此批评严复没有从中国的风俗形势出发,仅仅将西方的观点简单化地和绝对化地运用到中国,错误地认为民族主义不足强吾种。太炎强调,社会进化不同于自然进化的社会意识和人道规则,靠的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即讲历史和讲道

^① 鲁迅:《呐喊·自序》。

德。他提倡“国粹”就是要人爱惜汉种的历史，国粹维系国性，国性亡，国也亡；他又提倡“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强调精神与道德的作用，用佛入地狱的道德精神、殉难气概和众生平等的道德理想，来排斥以富贵利禄为中心的孔子儒教，以抵御西方文明取代东方文明。他批评严复“裨贩西学”，无视中国的国情、民族心理和文化个性，他强调文明，特别是文化，是由特殊的文化背景所产生，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或公式，应有别于自然科学界的定理。他撰写的《俱分进化论》，即是指出进化论并非客观公理，善进化时恶也在进化，西方物质文明发展同时，资本主义丑恶也在进化；他撰写《〈社会通论〉商兑》，即是对严复反对反清与革命的批驳。太炎的首先觉醒与他对“西方文明”的超前认识，对同时代的人是巨大启蒙，对鲁迅尤甚。鲁迅与当时许多热血青年正是在太炎这种影响下，由对严复奉为圣明到与之决裂，由对进化论的推崇到对精神意识的重视，由拥护改良到赞成革命。

在现实斗争中，太炎又认识到变法维新不足以救国，指出清廷已堕落为帝国主义走狗，不反清不足以救中华，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党”——“新党”，其致命弱点是“竞名死利”，他们只会依靠皇帝去搞改革，“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也绝不愿意用自己的头颅去拼斗，他们的改良主张与理论，只能是“政府之桀奴”。而革命者则是愿以自己的头颅去搏击、去流血、去撞开冰冷的旧世界的厚墙，用自己的身躯去建筑新的理想。太炎这些言行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震撼了一代知识分子心扉。鲁迅非常欣赏太炎这些言行，称为“令人神旺”，促使鲁迅等青年学子分清了革命与保皇的本质之别，从而纷纷摒弃保皇，投入了革命行列。